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对奶粉激素“高度重视”还是“高度暗示”？



短短几天,全国多个地方报道了“疑似吃奶粉导致性早熟”的病例,这显然已是一个全国性公共安全大问题。卫生部理当直接调查全国报道的病例,奶粉检测也应当由全国性机构主持,而不应交给湖北了事。并且,检测还不能限于某一品牌,而应针对所有上市奶粉,这才是“高度重视”。

媒体报道各地女婴可能因为食用圣元奶粉导致性早熟的报道,卫生部表示“高度重视”。

何以见得“高度重视”呢?根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介绍,“已经责成湖北省食品安全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查处理”。

而据了解,“湖北省食品安全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组织相关部门,抽取圣元奶粉的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并组织医学临床专家对涉及到的女婴进行临床会诊,同时开展医学调查,农业部门则制定了奶粉中雌激素的检测方法,并提供给湖北省”。

卫生部责成,湖北省办理,只是,我们不知道湖北省算是代表卫生部在处理奶粉安全疑问,还是被卫生部督促调查武汉三名女婴乳房发育的病因。

如果要处理的只是武汉三名女婴家长的投诉,那么卫生部责成湖北省调查原因,算是“高度重视”;如果要处理的是一个婴儿奶粉安全的公共问题,卫生部把事情交到湖北省处理,还能算是“高度重视”吗?

自从武汉三名女婴疑似因奶粉致性早熟见诸报道,不仅迅速引起人们对奶粉安全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的高度担忧,而且短短几天,全国多个地方报道了与武汉三名女婴相似的病例。事情显然已经不是三名女婴家长的投诉,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忧虑的公共安全大问题。

卫生部理当直接调查全国报道的病例,奶粉检测也应当由全国性机构主持,而且鉴于使用激素提高产奶率的情况普遍,奶粉激素检测向来都缺乏,奶粉检测

还不能限于某一品牌,而应针对所有上市奶粉。“高度重视”该是如此。

卫生部的“高度重视”,不仅将各地频传的女婴性早熟病例缩小成武汉三名女婴的问题,而且对调查结果进行了一种“预防针”式的指引:“还不能断定早熟婴儿与特定的食物或者环境之间有联系”。

这是对正在进行的调查的一种暗示吗?我们不能肯定。调查正在进行,当然不能断定女婴致病是何种原因,既不能断定这与奶粉有联系,与环境有联系,也不能断定这只是个别婴儿自身特异情况。然而,卫生部不表示“还不能断定早熟婴儿属于个体原因”,不表示“还不能排除与特定食物或者环境有联系”,却单单表示“还不能断定早熟婴儿与特定的食物或者环境之间有联系”。这是要人们做怎样的心理准备,希望产生怎样一种调查结果,是不是有一点呼之欲出的意思呢?

中国的乳业,恐怕真的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所以,大家要有所准备:女婴早熟不是因为奶粉,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她们个体的异常。嗯,“自身的异常”,这

确实不只有利于某个企业,而是有利于整个中国乳业,有利于中国的环境形象呢。

我们不只看到了卫生部“还不能断定早熟婴儿与特定的食物或者环境之间有联系”,而且听到了卫生部苦口婆心的科普:“对于儿童的性早熟问题,在临床上严格的、科学的诊断标准,它分为真性性早熟(中枢性早熟)和假性性早熟,而假性性早熟中的单纯性乳房发育是女孩发育过程中最常见的性早熟的征象,发病率约千分之二,而且原因不明。”

调查正在进行,但从卫生部的“高度重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结论:婴儿早熟与奶粉无直接关系,属于千分之二的发病率,病因不明。

至于用激素提高奶牛产奶率,从而使激素进入奶粉和人体的问题,这是可以慢慢和悄悄改进的,或者,甚至是可以不改进的。卫生部不是刚刚公布了最新而又史上最底的牛奶标准么,并无激素含量这一项的。激素嘛,反正我们吃得多了,鳕鱼是用避孕药喂的,鸡翅是用激素打的,美容是靠激素支持的,乳品里再有一点,算什么呢,嗯哼?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第二落点 “某奶粉”背后的社会恐慌出口在哪里

在新闻发布会上,包括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内,都以“某奶粉”来指代,对此,有记者认为,不提“圣元奶粉”的名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目前此事尚无结论,到底是不是因为食用奶粉而导致的性早熟还不知道。他还猜测,有报道说“圣元将起诉两家媒体”的消息,也多少影响了大家的发言。

现实中,我们习惯了“某品牌”之类的说法,因此,也就对“某奶粉”见怪不怪了,但是,如此的模糊化姿态,是在加重公众的怀疑情绪还是在舒缓公众的忧虑呢?相信明眼人一看即知,难道要让大家“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西谚云:魔鬼存在细节之中;老子则曰: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当

笔者面对“某奶粉”的魔鬼细节时,作家狄更斯的话语不时在耳边响起: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们当然可以反问:这是谁的最好时代?谁的最坏时代?其实,一切似乎都有征兆,我们生活在一个食品不安全的时代。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可是我们看到的怪象是只见“混”不见“还”。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某奶粉”的出现。事实上,这当然不是奶粉第一次出现

问题,正如有关人士反问的那样:为什么我们有了如此精密的社会管理分工,有了这么多的法律法规,却管不住一匙奶粉?为什么我们有了年年增长的GDP,国力越来越强大,却不能让母亲们放心地给孩子选购奶粉?到底是谁剥夺了她们这一权利,是谁让国产奶粉一点点地流失了公信力?

我们当然要考问食品安全监管的缺失,企业责任的后移,指责见利忘义者的卑劣。但仅仅如此吗?隐藏其后的逻辑链条更值得社会惊醒:生产环节的监控不严等导致了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流通环节的监管滞后导致了假冒伪劣泛滥,只有等到特事特办的运动式执法之时,才能焕发出巨大的暂时性效力;风头一过,常会

死灰复燃。

关于三鹿奶粉事件,曾有某专家大言不惭地说: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事件是意外、偶发的。那么,面对“某奶粉”,我们能醒悟吗?监管者的底线难道还要继续下沉吗?请记住,三鹿奶粉,当时也是被很多官员客气地称为“某奶粉”的。

常识告诉我们,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本身有局限性,它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真正能产生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保证外,还需要有诚实、公正、公平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面对“某奶粉”,重温这些常识,既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救赎。(朱四倍)

第三只眼 “激素门”未关,“奶源门”又开

有专家表示,因为厂家故意添加激素毫无用处,因此不排除激素可能是在奶源中就有所残留。那么圣元的奶源地在哪里?据圣元“优博”奶粉的官网刊登,当中宣传“精选来自欧盟纯净牧场的优质奶源”。不过,翻阅圣元在美国发布的年报,却发现已悄然改为进口自新西兰。

(8月11日《广州日报》)近期涉“门”的事件,都有一个规律,就是一“门”接一“门”,圣元奶粉的“激素门”还未关上,又有媒体质疑其“奶源地宣传”涉

嫌作假,为公众打开了“奶源门”。事件的起因是在圣元品牌的产品宣传中,均称用的是进口奶源。而圣元在国内却有奶源地,这就难免令人起疑,国内的奶源地去了哪里?圣元对此的解释是“国内奶源生产的是和圣元品牌无关的产品,圣元品牌的奶粉都是纯进口的”。好吧,就算是进口的,可是又出了问题。

在圣元官方网站中,其宣传语是“欧盟奶源 安全品质”,桶装奶粉的外包装上也标明“乳品原料全部来自欧盟”,但在外包装的底

部却有一行不起眼的提示:特殊情况下使用欧盟外的乳品原料。不知道圣元所谓的“特殊情况”,到底是何种情况?如果特殊次数过多,则就属于“惯犯”了。再者,圣元在美国发布的年报里,却将奶源地改为新西兰,这就更令人疑窦重生。

自从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奶源颇受公众质疑,进口奶粉被奉为圭臬,垄断了高端奶粉市场。也因此,诸多国内品牌大打进口牌,圣元只是其中之一。消费者高价购买宣称是国外奶源的奶粉,就是花大钱买个放心。然而,如今

厂家的奶源地都成为谜团,又怎能让消费者放心呢?而圣元也在风险提示中警告,“对于海外采购的原料不一定能做到像自己工厂那种程度的质量控制”,可见,企业对进口原料的质量控制都不敢打包票,那又该由谁来把关呢?

在毒奶粉事件中,不少“优质”企业都曾说过谎,消费者经历劫难后,再也不会轻易相信它们了。“奶源门”的开启,再次表明大家对奶粉企业的不信任。这些门再要关不上,中国的奶粉业就彻底毁了。(江德斌)

热点纵论 在权力的字典里,申遗哪有“不值”

中国又掀起了“遗产热”。根据建设部的统计,目前中国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中国丹霞”申遗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彭华说,“花十几个亿拿到6个地的遗产品牌,在国内申遗史上花费算比较少的”,“我说花得值”。

(8月11日《广州日报》)花了这么多钱,用了这么长时间,这样的申遗能有“不值”的么?至少,申遗算是成功了。事实上,即便申遗失败,恐怕也是“值”的。

在权力的字典里,很少有“不

值”二字。一些地方的马路修了挖,挖了修,哪个地方政府曾说过不值呢?对地方官员而言,至少有了GDP,至少有了政绩。申遗恐怕也是如此。按照彭华教授的介绍,这次申遗很多钱花在了景区基础建设和配套设施上。即便申遗不成功,恐怕还是有GDP的,至少还搞了基础设施建设,恐怕也是“值”的。

但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恐怕就未必“值”了。“中国丹霞”申遗牵头的湖南崀山所处的新宁县,为这一次申遗据说花了4亿多元,而其2008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2亿元。一次申遗就花了两

年的财政收入,这是一场“豪赌”。其他如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不知道是否还有钱投入。申遗成功了,政府官员是高兴的,可老百姓呢,恐怕要欲哭无泪了。

此次申遗成功后,贵州赤水、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等地都在说自己的丹霞地貌最美。这么多丹霞地貌旅游景区,将来都能挣钱么?各地的旅游业都能发展起来么?对全国人民而言,花十几亿申遗也未必是好事。申遗刚成功,广东丹霞山就传来了门票要涨价的消息。申遗成功了,就要涨门票。将来都申遗成功了,门

票都涨了,“中华儿女”还有风景可看么?

彭华教授说,世界遗产被称为“地球的名片”,是所在国家的荣誉和自豪。即便是“地球的名片”,它还是一张“名片”,或者说是一个称呼,一张牌匾。花这么多钱,去搞一张“名片”,就一定是值得的么?申遗到底值不值,需要多重视角,不能只算政绩账、旅游经济账,还要算民生账、遗产保护账。倘若只算政绩账、旅游经济账,“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地去开发,将来恐怕会在子孙那里留下骂名。(刘义昆)

公民发言

“戒烟再上班”意在检验服从性

四川眉山东坡区拟出台禁烟“新规”,凡承诺戒烟的正科级以上干部,如没有戒烟,就请“戒了烟再上班”。

(8月11日《华西都市报》)

戒烟在任何情况下都纯属个人选择,所以烟就变成难戒的东西,它既容不得“外部势力干涉”,又不容易做到意志坚定。

“戒了烟再上班”是行政力的介入,以行政力量来敦促公务员戒烟很有趣,纯属个人意志作决断的事被组织“干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首先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假设可以用行政力戒掉烟,那么同样可以依法操作“戒赌再上班”,“戒抠脚丫再上班”,人的一切嗜好、恶习、毛病都可以“戒了再上班”。再推论下去,这办法可以造出圣人,什么毛病都可以戒掉的,那就是圣人。

公务员也是人,他们也会对此反感,但他们同时又因为公务员身份而“人在组织,身不由己”,听组织的还是听自己的就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是长期并广泛存在的,有时它会演变成这样一种考验:你到底有多听组织的话?集体为大,个人为小,如果足够听组织的话,那么,戒掉烟是不难的,能不能戒掉烟,就代表你到底听不听组织的话,听到何种程度。

禁烟办有关负责人说:“通过发放自查表的方式展开自查,不仅可以检验东坡区干部是否会向区委区政府说实话,还可以检验东坡区干部的行政执行力到底如何。”这才是实话实说。戒烟只是一个检验的手段,检验的目标是干部有没有对组织说实话,组织的活干部不听。“戒了烟再上班”看起来荒唐,但对只有对人之术毫无了解才会这么想,有许多问题比吸烟对社会的危害要严重得多,譬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社会反应强烈的问题,可有谁见过“戒了公款吃喝再上班”、“戒了公车私用再上班”?在治理真问题上向来走怀柔路线,惟有戒烟这种小问题上才会时时祭出重典,这也再次重申一个道理:没有无缘无故的怀柔,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重典,怀柔有怀柔的理由,重典有重典的道理。(范大中)

公民发言

公务员家庭年收入11元是在糊弄谁?

一篇名为《震惊:海淀区此次限价房申请者全是专利局的,要团购???》的帖子引起广泛关注,有网友上传了一份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的公示表格截图。一长串密密麻麻的名单中,限价房所有的申请者均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记者经过核实,确有此事。(8月11日《广州日报》)

当地方公务员集体居住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不再是新闻时,国家部门公务员团购限价房就有了新鲜感。继农业部公务员团购限价房曝光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团购限价房“接棒”,不知道下一个遭遇曝光的国家部门是哪个?

本人见过不少政策性住房申请者的信息公示,但从没见过这么离奇的公示信息。在家庭年收入一栏中,有公务员家庭年收入只有11.1元,而其相对应的家庭总资产净值为15.6万元。显然,这11.1元是随便填了糊弄人的,如此荒唐的公示信息,竟然通过了层层审核,公然挂在了房地产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

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叫停了国家机关集资合作建房,以遏制福利分房。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公务员供地建房,很像是集资建房的回归;与过去不同的是,仅仅是在房管部门走一个过场做样子,只是走过场没当回事,才上演了年收入11.1元的荒诞剧。有消息说,在住宅用地中,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量同比增加99.2%,但面对普通百姓的保障房源并没有明显增加。从公务员“包场”的鲜活例子来看,保障房只见“供地”不见“供房”的秘密,或许正在于此。(冯海宁)